

重写文明史与重写各学科史

从“已写”到“重写”：中国文论现代性的错置与重建

——曹顺庆文论之思的历史、理论二重逻辑与价值评估

刘朝谦

摘要：书写方法的去中就西，造成当代中国文论乃是失语的理论，失语，即是失去本己的民族身份，失去理论话语的独特性。这样的文论因此不具有同西方文论对话的资格和力量。曹顺庆先生对此种现象以“失语症”名之，撬动了原本对此现象无所知觉的学界，引发了广泛的争论。我们认为“失语症”是曹先生对中国当代文论现代性错置的审理和诊断，揭示了中国当代文论所存在的现代性危机。曹顺庆先生进而号召学界中人重写文论史，其所说的“重写”乃是对“失语”的治疗，是对中国当代文论应有的现代性的重建。由于曹顺庆先生将文论史的重写置于文明史的重写工作中，“重写”因此根本地是对世界格局中的中国形象的真实再现和重新打造。曹顺庆先生的文论之思行于比较诗学之路，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警醒学界，其学术操心和学术承担类似于海德格尔所说的守望人世平安的诗人中的诗人，又类似于挽初唐宫体诗颓风、开盛唐诗歌格局的陈子昂。

关键词：曹顺庆；文论之思；失语症；文论重写；现代性

DOI:10.13760/j.cnki.csalt.2025.0070

回看曹顺庆先生这几十年来针对文论的思与言，我们会发现其中有两个路向最为重要：一是先生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针对自近代以来中国文论工作者依托西方学术话语框架书写中国古代文论体系的方法、价值取向进行反省和沉思，敏锐地看到此期中国文

论的书写因主动舍弃了中国传统文论的言说方式，在言说学术思想的话语方面患上了“失语症”；二是号召学者重写中国文论。前一路向是对“已写”的中国当代文论疾病征候的诊断，后一路向是为治疗文论“失语症”所开出的药方。本文尝试对先生关于中国当代文论的两个思与言的路向的历史和理论逻辑进行梳理，并给出价值评估，以见出先生的学术工作对中国当代文论研究所起到的深刻而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从“失语”到“重写”：对中国文论现代性的学术操心

曹顺庆先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所思所言的重要学术问题是：中国当代文论在世界文论格局中是否有自己特定的身份、地位、权利和声音？其在世界文论格局中的一切言述同自身的思想和理论价值是否匹配？什么样的中国文论才能在世界文论格局中受人尊敬，他者才愿意与之平等对话，且愿意接受、使用？先生为此审理中国当代文论研究的现实情形，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当代文论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观念的生产，其生产所依据的尺度、知识框架、思想方法和话语体系等都出现了问题，一言以蔽之，中国当代文论患上了“失语症”。

先生所说的“病人”是用现代汉语写作的，依西方文论知识框架、动用科学理性思维进行生产的中国当代文论，它在整体上已经全然不同于中国传统文论。先生所说的“失语”，“语”不单纯地指语言，而指的是话语。在话语的场域中，语言虽然重要，但它只是话语诸要素中的一个要素而已。曹顺庆先生指出，“失语”的意思“是说在这种中西知识的整体切换中我们丢失了自己的知识方式”^①。先生强调中国文论在前现代原本有着自己的知识生产方式，有着自己不同于西方知识观的话语体系，但是，在近代“以西格中”式的知识观宰制理论界之后，近代中国学人将中国古代文论知识与西方知识进行整体切换，舍中取西，抑中扬西，使其创构出来的新的中国文论话语显现出“不中不西”“似中而实西”的尴尬情形。

先生在此所说的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当其作为知识，主要是感性十足的经验知识，经验知识的合法性不由抽象的思辨逻辑或科学实验给出，而是由文

^① 曹顺庆：《从“失语症”、“话语重建”到“异质性”》，《文艺研究》，1999 年第 4 期，第 37 页。

学活动的实相来给予认识。^① 西方文论话语当其作为知识，主要是理性的科学知识，知识的生产与消费都由理性的思辨逻辑来推动，知识的合法性要由逻辑的自治来满足。^② 中西文论知识的整体切换因此是中国传统文论之经验知识同西方文论之科学知识二者的整体切换。文论知识质态的整体更改，必然导致话语诸要素的改变，即说话人、受话人、文本、语境和沟通之性质、形式与内容的改变。

如果我们从文论史的角度看，那么曹顺庆先生在此所说的中国传统文论话语体系、知识观和价值观的“丢失”，指的是一个原本拥有，最终却失去的事件。对于一个国家的文论来说，此次丢失是一个极为重大的事件，因为在此次事件中丢失的不是一件物品，不是无关紧要的人，而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曾经拥有的文论话语，并且，同文论话语一起丢失的还有古人心中的天和道。古人认为，天不变，道亦不变，但是在近代，中国古人向来认为绝不会变更的天和道都变了，而且是以被新的天、新的道抹消的方式消亡于历史的舞台上。在此，传统文论话语的丢失映照的是中国在建构自己的国家现代性之时主动对自己的国家传统性的抹去。从根本上讲，这一丢失是 20 世纪初中国被迫走向现代国家而造成自身国脉和文脉古今断裂的一个结果。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是中国脱离古代、走向现代的历史重大节点，在这一时间节点，现代中国以同古代中国断裂的方式迎来自己的新生。^③ 此时所发生的断裂是国家层面的，因而是整体的断裂，从国家的制度、国家政治的价值观、世界观，到教育、科技和文化等方方面面都表现为弃绝古代、走向现代。文学和艺术同样表现为整体的从古代出走，一变而为现代的文艺。在文艺领域，这一时期所发生的断裂景象一方面呈现为古代中国文学艺术从实践到理论和批评的消亡、崩塌，现场一片残砖断瓦，另一方面呈现为现代中国之文学艺术从实践到理论和批评得到初建，到处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对于中国文学而言，此种断裂从根本上乃从语言开始发生，即白话文对

^① 学者或以为中国古人的思维不是经验论的，而是直觉、顿悟。如胡伟希在《语言与存在——中西方思维方式与心智深层结构》〔《文化：世界与中国（二）》，生活·读书·新知出版社，1987 年，第 204 页〕一文中就持这样的观点。但是，笔者认为，中国古人的直觉、顿悟思维所生产出的知识，却是经验的，而非科学的。

^② 关于科学思维乃是西方人思考一切的主要方式的观点，是很多学者都认可的，胡伟希在《语言与存在——中西方思维方式与心智深层结构》一文中就有详细的阐述。

^③ 鲁迅先生描述当时欧风东渐，且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主动去往西方学习欧洲先进的思想文化，说：“洎夫今兹，大势复变，殊异之思，激诡之物，渐渐入中国，志士多危心，亦相率赴欧墨，欲采掇文化，而纳之宗邦，凡所浴颢气则新绝，凡所遇思潮则新绝，顾环流其营卫者，则依然炎黄之血也。”（鲁迅：《破恶声论》，《集外集拾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年，第 19 页）这一思潮是造成中国旧新文化断裂的主要推手。

文言文的取代，或曰现代汉语对古代汉语的替代。发生在中国近代的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事件绝不是作为工具的语言的变换，因为文学乃是语言的向美而生，且在此走向中直指文学主体作为人的存在本质。海德格尔认为，最接近本质的“说”，是诗歌之言，因为唯有诗不是人随意说道的话：“纯粹所说乃是诗歌。”^①海德格尔因此将语言视为人存在的家园，据此以观中国近代白话文之取代文言文这一事件，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一事件不仅是两种汉语形式的代换，而且在根本上是中国人自身存在之家的历史断裂，是中国人在近代主动放弃了自己旧有的语言、文学和诗性之家，用白话文或曰现代汉语构筑了中国人盛装现代性的新的存在之家，构筑了可以让文人和劳苦大众共居的文学家园。由此造成的文学家园之废兴，必然随之反映在文学理论和批评领域。

由于文学活动在现代中国主要属于现代汉语向美而生的活动，对理论和批评而言，其思与言的主体和对象均发生了全面的变更。也就是说，古代中国人栖止于其中的由文言文构筑的文学家园，其文学活动是文言文向美而生的活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批评即以此为自己思与言的对象而得到展开。现代中国的文学活动变更为由现代汉语构筑的文学家园，中国古代既有的文论和批评话语不再能适应现代汉语所生产出的主体和对象，文论家故不得不在 20 世纪初开始中国现代文论的创建。创建，一方面加剧了中国文论话语古与今之间的断裂程度回溯；另一方面，又以创建新的文论话语的言行认可和表征断裂。创建因此在本质上是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在历史上的初次构筑。

社会、国家之现代性构筑是 19 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形成的历史大趋势，在这一趋势中，有的国家获得的现代性整体是内生的，因而也是健康的；有的国家获得的现代性整体是外力强加的，因而自其初生之日就带有种种的先天之疾。也就是说，当时各国步入现代的情形无非有两大类。一是主动步入现代，且引领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国家。这类国家告别古代步入现代之时，在人文精神领域一般并不尽弃其传统，如在文论领域，西方现代文论在精神观念生产的机理上并不完全弃绝古希腊文论话语得以生产的知识构架和理论逻辑，相反，现代西方文论一直对自己的古代之源充满自信，给予发挥。二是被别国驱使、不得不步入现代的国家，中国就属于这一类国家。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初次创建的现代性是被动生成，所以天生带有种种问题，是错置的，即不正确、充满错谬的现代性。中国现代文论的失语是中国国家现代性错置的一个具体表征，这就是曹顺庆先生所断定的文论“失语症”。因此，

^① 海德格尔：《语言》，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上海三联书店，第 986 页。

先生所言“失语症”，是对中国文论在20世纪初建构起来的现代性乃是错置的现代性的判断，其判断对20世纪以来“已写”的中国文论话语给予了总体的批判和否定。

曹顺庆先生的另一个重要的学术路向，是他基于中国当代文论患上“失语症”的现实，进而探寻中国文论话语书写应该依据的正确的知识观和书写方法。在这方面，先生先在90年代提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在近期更是提出了重写文明史、将文明史的重写具体落实到重写各个学科史的主张，把文论的重建置于文明史重写这一更加恢宏的文化工程之中。我们在此将先生的这一学术路向名之为对中国文论之话语体系、知识质态给予重写的主张。

曹顺庆先生上述两个学术路向都围绕着一个中心点而生发和展开，这个中心点就是中国文论之现代性品质。其所提出的文论“失语症”认为“已写”的中国文论是中国最初获具现代性的文论，其现代性是由中国文论取自西方现代文论之方法和知识观的产物，从近代到当代，中国文论的现代性生产方式一直是取西而弃中的，文论之思与言的“失语”因此在本质上是中国文论从古代向现代转型这一历史过程中，由推动转型的一代学人对现代性的理解不够透彻、有所偏差而造成的。“失语症”乃是中国文论患上的现代性病症。这一病征表明中国文论从其获得现代性的历史起点处，就一直带有致命的现代性危机。

重写文明史的学术路向则是对中国文明整体现代性的重新书写，当其落实到对中国文论之重写时，目的就是针对中国文论在现代性上的错置或曰“迷误”给予纠正或曰“转换”，曹顺庆先生对这种“迷误”和“转换”进行了具体的描述：

值得注意的倒是春青所说的“话语转换”的迷误，即把古代诗学贴上现代学术话语（其实是西方话语）的标签。例如认为“感物”、“兴会神到”就是审美体验，“神思”、“神与物游”即是“艺术想象”等等。这种“贴标签”式的现代话语转换，并非始自今日，实际上这是一个使我们“迷误”了许多年的老问题，老一辈学者称这种“贴标签”方法为“将古人现代化”，早就有学者对之进行批评。然而遗憾的是，这个“迷误”似乎无法摆脱。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学者们孜孜矻矻地干着“贴标签”的工作，只不过今天贴这种标签，明天又换另一种标签。^①

中国文论的重写，在方法论层面是对“将古人现代化”的方法的摒弃，

^① 曹顺庆：《“话语转换”的继续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文艺争鸣》，1998年第3期，第6页。

曹顺庆先生指出：

我们试图从传统文论的意义生成方式、话语表述方式等方面入手，发掘、复苏、激活传统文论话语系统，并立足当代，在中西对话中重建当代文论话语。这些方法包括对传统文论话语的探寻、研究和整理，在中西文论对话中使其凸现与复苏，在广取博收中重建，并在中外文学批评实践中检验其有效性和可操作性。这是一项浩繁而艰巨的学术工程，但我们愿为之尽绵薄之力，并希望有学界同仁来关心、支持和参与这项工作。^①

“发掘”，既指对中国古代文论文献的发现、收集和整理，也指对古代文论知识观、话语体系的重建。“复苏”指为中国古代文论注入生机，这一学术工作的任务主要是完成古代中国文论同当代中国文论从里到外、从形到神的无缝对接，构筑中国古代文论活在当代的有力根据。“激活”意同“复苏”，都是要将中国古代文论从历史博物馆中取出来，放到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中，放到当代中国人的文学生活中，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令其充满活力。同时，先生特别提到要让中国传统文论在西方世界里也成为鲜活的、有效的文论和文学批评话语。

曹顺庆先生的这一定义表明，“重写”在根本上乃是在当下对中国文论自主意义生成方式和话语表述方式的重建，重建之必须，是因为以前的中国文论在这些方面的初建是一种错置，需要学界在当下通过重建的行动，赋予中国传统文明和中国文论以正确的现代性。重写要赋予中国文明和中国文论的现代性是这样一种文明品性：它是基于中国文明、中国文论自主知识体系、意义生成和话语表述方式，在同西方文明和文论话语对话中生产出来的既有中国传统身份、民族性格，又在当代世界文明和文论话语场域中享有话语权的现代文论话语。

从逻辑之维看，曹顺庆先生这两个学术路向之间有着必然的关联：病症诊断清楚了之后，“医者”接下来必然要思考的就是如何治愈这种疾病，所要做的就是为此开出对症的药方。于是，曹顺庆先生在诊断出 20 世纪以来中国文论研究患上“失语症”之后，必然会转向他的另一个学术追问：既然现有的中国文论研究患上了“失语症”，那么，我们是坦陈此症无可救药，放弃治疗，还是坚信此症可以治愈，从而积极寻找治愈良方？如果中国文论研究的“失语症”是可以治愈的，那么，治愈的良方究竟由哪些“良药”构成？治愈

^① 曹顺庆：《“话语转换”的继续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文艺争鸣》，1998年第3期，第6页。

的最佳方法是什么，在哪里？种种这些学术追问自然构成了这一学术思想路向所要关心的主要问题域。

我们认为，上述两个学术思想路向以及二者之间的逻辑关联，直观地体现了曹顺庆先生对于中国文论话语当代建设一以贯之的学术关切，这两个学术路向所生产出来的学术观点、所实行的学术批判和所指引的新的学术书写路径，等于是20世纪以来原本守常成习、波澜不惊的中国文学、文论领域扔下了一块巨石。在先生大声疾呼中国当代文论患上“失语症”之前，失语的症状一直存在，偶尔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当代人文学术现代性有所错置，但是，个别学者在这方面发表的声音在学术界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只是当曹顺庆先生明确指出中国当代文论患上了“失语症”之后，国内众多学者才真正对失语与否问题有了热烈关注和响应，引发了广泛而持久的争论，形成了学界之海中一时的滔天巨澜。^① 而不管学术界中人对曹顺庆先生提出的观点是认可还是进行商榷，曹顺庆先生在他的两个学术路向中生产出的观念成果，都实际地代表了先生至今为止所取得的最为重要的学术成就，并且这些观念成果已经以中国当代学界多方积极参与、热烈讨论和争执的形式，成为中国当代文论研究的主要现实景观之一，成为中国当代文论之研究和历史的重要内容。

二、20世纪中国“已写”文论话语现代性批判

我们在此所说的“已写”，指中国从近代开始，由陈钟凡、郭绍虞、罗根泽等先生所开启、奠定的以西格中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书写范式，这批老学者身处西方大学取代中国传统的国家经学教育，现代学科开始在中国设置的时代，宗奉科学和民主精神，且受到日本学者用西学方法撰写的中国文论史影响，试图把文论从传统的直觉体验语式变为理性的科学知识话语。他们受白话文运动的影响，开始用现代汉语书写中国文论史，将中国古代文论置于西方文论的理论框架中，用现代汉语给予重新阐释。这批老学者是中国现代

^① 肖薇、支宇在他们所发表的论文《从“知识学”高度再论中国文论的失语与“重建”——兼及所谓“后殖民主义”批评论者》（《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6期，第134—138页）中说：“董学文先生认为，用文论‘失语症’来描绘和概括本世纪特别是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的总体状况，认为视当代中国文学界根本‘没有自己的理论，没有自己的声音’，并因而主张要‘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是严重片面的失真的’。”“高楠先生认为，本世纪的中国文艺学并未失语，西方文论进入中国后大都被中国文艺学同化了。”又列举了周宪和陶东风从“后学”视野反对“失语症”说法的观点。反对的观点虽多，赞成的观点也不少。据此我们可以看到曹顺庆先生关于中国当代文论“失语症”的说法的确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文论的拓路人，其文论书写方法一经出现，就很快为其他中国学人所效仿，成为中国文论话语从古代走向现代的初始范式，中国文论从此成为具有现代性的文论，其原有的古代话语体系、知识谱系皆迅速消亡。

由中国现代文论之拓路人开拓的中国文论书写范式在现代学科体系中乃是作为文艺学的基础内容，存在于大学中文系的文论教科书和教学语境里，然后再由中文系学生将之带到大学之外的社会生活。在今天看来，最早赋予中国文论以现代性的上述书写范式不仅成为一种“已然”的历史事实，而且其成果和书写的路数在当下依然被中国文论界的大多数学者看成是不言自明、至今依然有效的文论话语书写主要的规约。在当下的中国文论学术领域，这种赋予中国文论以现代品格的文论书写范式作为一种“依然”的现象，继续主宰着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运思与言说。所以，属于“已写”的中国文论同时也属于现在进行中的中国文论书写，这种文论书写本身以及其所书写出来的中国文论话语，既构成了当代中国文论现代性生成的历史轨迹，又构成了近代以来，乃至于整个当代的中国文论。曹顺庆先生关于文论“失语症”的说法，就是针对这一既属于历史，也归于当下的特定中国文论话语而言的。

1996年，曹顺庆先生对中国自20世纪初以来“已写”文论话语进行学术反思和批判，明确指出中国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文论研究患上了“失语症”：“1996年初，我们以比较集中的方式提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最为严峻的问题是理论‘失语症’。同时提出，要走出失语症，应在实现中国传统文论现代转换的基础上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该问题的提出引起了较为广泛的讨论和批评，三年来，我们在上述题域中陆续做了一些探索。”^① 在这一段话里，先生所说“中国当代文论”，既是当代的，又是近代的。

20世纪初，中国文学理论得到了现代性改写，这次改写在中国文论史上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它带来了中国文论话语如下重大的变化：

首先，以前用文言文书写的中国文论现在主要用现代汉语来书写。

其次，文论作为思想、理论和知识的框架主要是从西方文学理论那里拿过来的，文论理论话语的整体框架开始主要呈现为由本质论、创作论、文本论、接受理论、批评论和文学史论等几大理论板块共构生成。

再次，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改写不是旧式文论书写方式的改良，而是革命，书写者自觉弃置传统文论关于文学的工具定义，欲将文学的本质定位到作为语言审美活动这一本位之处；欲要弃置文学理论话语的传统性，而令文论得到人类现代社会所具有的现代性。通过改写，中国文论得以走出传统时

^① 曹顺庆：《从“失语症”、“话语重建”到“异质性”》，《文艺研究》，1999年第4期，第37页。

代，真正成为现代社会的理论，这一书写目的，让中国文论的近代书写在本质上成为中国文论现代性的初始建构，由于文论在其中经受的是代际话语整体转换，因此，其书写必然是革命，而不可能是对文论话语的改良。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内部的话语逻辑在这次革命性的改写中被整体改变，按曹顺庆先生的说法，就是中国旧有的文论书写所依据的中国知识观被西方知识观以科学的名义整体解构、颠覆、抹去，中国传统文论的旧有话语逻辑体系在新写成的具有现代性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中整体崩解，不复得存。

“失语症”成为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的疾病症状的根本原因，在于近代中国文论对中国传统文论话语体系的改写不是兴盛一时、转眼即衰的短暂思潮，中国文论在近代创立的现代性书写原则和方法在现代和当代中国的文论领域一直得到学者、理论工作者的认可，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话语规约。现当代的中国文论主要是由现代汉语写成的，此时的文论话语哪怕是以中国古代文论为对象，其理论的话语体系也是以西方文论的理论、知识框架为自己的框架。这些现象表明，从近代到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理论逻辑在本质上已经西化，已经成为学术界默认的真理，成为当代中国文论工作者在书写文论话语体系之时不约而同地给予自觉遵守的书写范式。

在曹顺庆先生看来，中国当代文论的现代性危机就在于此，因为，失语真实地普遍存在于学者书写出来的文论之中，但是，大多数学者意识不到失语的存在，其对失语的无知无觉，根源在于人们对中国当代文论奉为金科玉律的以西格中式的书写方法缺乏必要的学术审理和学术批判意识。这样的情形，借用海德格尔的一段话可以让我们增进感受。海德格尔说：“不光诸神和上帝逃遁了，而且神性之光辉也已经在世界历史中黯然熄灭。世界黑夜的时代是贫困的时代，因为它一味地变得更加贫困，以至于它不再能察觉到上帝之缺席本身了。”^① 意识不到失语，即便听到了失语的诊断，还坚持认为中国当代文论没有失语，都表征了中国当代文论世界之贫困。据此我们可以说，“失语症”的提出，明确了曹顺庆先生的如下态度：自近代开始的书写不应成为学界默认的真理，其作为文论书写范式存在的合法性需要重新审理，中国文论话语经由近代改写而获得的现代性是否健康，值得怀疑。也就是说，中国文论的现代性历史进程的学术价值必须予以重估。曹顺庆先生给出他自己的意见，即中国文学理论的近代改写因为在总体精神上以西格中，从而是用西方的文论话语逻辑替代了中国传统的话语逻辑，让当代中国文学理论一方

^① 海德格尔：《诗人何为》，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407—408页。

面成为一种丧失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和文学身份的理论，另一方面又成为一种学西而不及于西的文论，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因此在世界文论格局中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得不到他国学者的关注。先生因此呼吁中国学者注意到这一点，应对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书写范式给予批判和正当的否定，进而对中国原本拥有的文论话语体系进行重新审理，在此基础之上，重塑中国文论自己的国家、民族和文化身份，以让中国文论在世界文论格局中真正成为一种独特而极具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的声音。曹顺庆先生一生的两个重大的文论思想进路至此已经明确地显现出来。

曹顺庆先生在 1996 年有这样关乎当代中国文论建构之本质与书写的根本方向的深刻思考，提出“失语症”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体系这两种重要思想，与世界和中国国内在 1996 年呈现出来的学术思想现实有密切的关系。

从世界范围看，正是 1996 年前后，世界在政治、经济、文学和艺术等方面进一步达成全球化，世界各种文化、各种文明在全球化语境中虽有冲突和争执，但各国学者在相当程度上做到了互相尊重、彼此宽容，世界学术格局虽仍以欧美为中心，但其中确实出现了既众声喧哗又和衷共济的情形。在欧美学者中，已有像赛义德这样的美国学者点明：西方对东方的研究生成的乃是西方的东方主义，学界至今未有真正属于东方的东方主义出现，而东方的东方主义才是真正的东方主义。赛义德的这种学术思想直接挑战了西方中心主义，表达了东方的知识和思想理应步入世界中心的诉求，其建构东方的东方主义的呼喊对中国学者反思本国学术的文化身份和基本品质，力图将文论的民族性同现代性正确地糅合在一起，生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真正属于中国的文论话语体系是具有启示性的。事实上，曹顺庆先生对中国当代文论“失语症”的诊断，其胸怀从一开始就是全球性的，其对中国当代文论的思与言从来就是立足于比较诗学视野的关切。

我们认为，支撑曹顺庆先生上述两个学术思想进路的支点主要有两个：

一是将中国文论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型同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关联起来，将中国当代文论的书写视为中国步入现代社会的一个产物。自英国 19 世纪完成工业革命，率先成为现代国家以来，世界各国先后步入现代，这一历史进程是推动中国在 19 世纪末 20 世初转型为现代国家的主要力量，中国近代文论的书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此而言，中国文论的近当代书写，从一开始就是具有现代性，随着中国现代文论或曰当代文论的生成，中国古代文论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文学实践中都几乎消亡。

人类对现代社会相对于古代社会的巨大历史进步充满颂美之情，这反映在中国就是人们对文论现代性的获得自近代至今一直持肯定态度。1996 年，

在哲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学者已经在谈论现代性危机之后，中国文论工作者总体上仍然对中国当代文论的现代性危机缺乏认知，整个学界在曹顺庆先生提出“失语症”之前，几乎没有关于文论的现代性危机意识的。然而，现代性从来就是一把双刃剑，现代性在表征人类社会的巨大历史进步的同时，又现实地掏空了人存在的意义。正是在掏空人的存在意义这方面，现代社会产生了自身最为严重的危机。不管人们是否注意到，中国文论的现代性危机自现代中国文论被创构以来就一直存在，曹顺庆先生在中国学界率先注意并大声喊出来：中国当代文论患上了“失语症”。其注意与呼喊从存在诗学的维度看，是曹顺庆先生认为中国原有的文论表征了中国人在古代几千年里其作为人的存在在文学之思上的意义丰盈，见证了中国古人如何把文学认知并实践为人存在意义的沛溢，是曹顺庆先生深痛于不正当的中国文论现代性的生产一方面毁去了中国原有文论对人的存在意义的丰饶之产，另一方面又为当代中国人生产出一种似真实伪、不属于中国人自身的存在意义。而且，中国学者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里，对此种现代性危机麻木不仁，把中国当代文论所生产的不中不西、奇怪的文学意义当作文学应有的意义。就此而言，曹顺庆先生对当代中国文论“失语症”的诊断颇似无声之处骤然响起的一声惊雷，在本质上乃是他对中国当代文论所存在的现代性危机的深刻揭示。其揭示得以发生的学术力量，产生于先生恢宏的比较诗学视野，这一视野决定了他对中国当代文论现代性危机的揭示，乃是他对中国文论之全球身份与处境的关切。

二是对文论书写方法论的思考，这方面的思考承认文论的现代转型具有历史的合法性，但是，每个国家、每种文论话语现代转型的道路、方向和方法是否正确、得当，最终决定了其所生成的现代性是否具有存在的正当性，当生成现代性的道路、方向和方法不当之时，所生成的现代性也许是合法的，却未见得是正当的和有效的。这方面的学术关切明显地注意到一种文论在其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必然会面对的一个问题：文论话语的现代转型乃是本土文论的全球化与全球文论的本土化，在此现代转型过程中，本土自古就有的文论传统身份、旧有体系何去何从？是被现代拒绝，还是被现代兼容，往往表征了转型所生成的现代文论之正当性与有效性。具体到中国当代文论，曹顺庆先生特别提到了“以西格中”方法乃是中国文论获得现代性的主要方法，这一方法将西方文学知识、理论框架移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核心框架，即使书写的是中国古代文论或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也是如此。文论的这种书写将中国古代数千年的文论话语体系弃之不顾，失去原有话语逻辑的中国古代文论资料成为碎片化的文字，被人为地填入西方文论的知识、理论框架之

中，被阐释为对文学本质、文学创作、文学文本和文学接受等文论板块的血与肉。如此生成的现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其整体体系的抽象形式乃是西方的，其具体的命题和范畴却是中国古代的。曹顺庆先生认为，这样的中国当代文论是不正当的，因为从话语体系的角度看，中国当代文论有中国之名而无中国之实。同时，对应于中国自身的文学实践，这样的中国当代文论难以给予有效指导。

我们认为，曹顺庆先生对中国的当代文论书写方法的反思，实际上触及了中国现代文论与殖民和后殖民文化的关系这一问题，这一问题生发于中国在近代所处的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这一历史语境之中。具体说来，就是中国文论在近代从古代文论向现代文论的历史转型，是由中国在当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促成的，即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不是中国文论内生的、自觉的、主动行为，而是出于国家救亡的紧急需求而猝发的被动的行为。当时，中国不在思想和器物两个层面尽快完成现代化，就要面临亡国的危险。^① 所以，近代中国在思想和器物两方面的改变不得不依照西方的现代框架和尺度，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就是近代中国在思想层面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情。然而，中国文论在近代之创构自身的现代性是被动的，是在国家救亡需求下所驱动生成的急就章，这使得它的现代书写无论从知识观、价值观，还是从书写的方法来看，都不是经过学术深思生产出的结果，但其学理的缺失和粗糙被时人忽视，成为生来就带有浓厚殖民气息的文学理论。也就是说，中国当代文论的现代性因上述历史原因，生来就同西方思想对中国的文化殖民纠缠在一起，这种后殖民文化观念的影响，应是在曹顺庆先生提出“失语症”之前，学界一直对文论书写工作形成不了批判意识的主要原因。

从 1996 年中国学术思想现实情况来看，当时，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历了思想的解放，人和文学的回归，美学泛起热潮，国学得到重讲，国内学术全方位地拥抱世界，西方学术思想和理论资源重新如潮水般涌向中国，中西诗学和文学的比较兴起并蔚为大观，诞生了以曹顺庆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学派。这十多年里，也是中国日益繁荣昌盛，一步一步地变成世界政治、经济大国的时期，中国在政治、经济上的日益强大客观上令中国当代文论自身一直存在的现代性错置问题被放大，被空前地突显出来。其被突显出来的一个

^① 萧功秦在《儒家文化的困境——近代士大夫与中西文化对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中详细描述了清末中国君臣、一般文人对世界极度无知，妖魔化西方，西方列强的侵略到来之时，上下无力应对，这种国情逼使中国的有识之士转而向西方学习科技和人文思想。通过其描述，我们可以联想到中国古代文学和文论同晚清文化一样，也趋于没落，于是，文化向现代转型的初始推力就开始产生。

重大问题就是我们已有的现当代中国文论明显无法同占据世界文论场域中心的西方文论比权较力，我们只能在西方文论前进的步伐后面跟随，并驾齐驱尚且谈不上，更说不上超越。事实上，直至今日，中国文论以中国身份成为世界文论中心的一种话语仍然是一件未能成功的事情，尽管乐黛云先生说：“任何体系和中心都不是绝对的，不可更改的，认识这一点至关重要。这导致了发达世界自我中心的解体，也就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文化建构的无可挽回的破碎。”^① 乐先生强调必须对任何体系和中心的相对性和可变动性有所认知的观点当然是正确的，但据此判断西方世界中心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期间的解体和文化建构的无可挽回的破碎，却过于乐观了。至少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的现状尚不足以支持这一判断。正因如此，曹顺庆先生在当时所描述的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现状才有了极为沉重的现实意义。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在曹顺庆先生强调中国当代文论这一现实窘境之前，中国学者几乎没有人能就此发出大声呐喊，尽管有极少数学者已经对此深有体会，但并没有人像曹顺庆先生这样，将中国文论的现代性危机用“失语症”以名之，层云虽起，到了曹顺庆先生这里，才最终形成了划破天空、照亮深渊的闪电。在曹顺庆先生喊出“失语症”之前，大多数学者在其研究工作中，一代复一代，总体上皆下意识地服从于文论现代史巨大的惯性，依然集体地把“以西格中”的中国现代文论研究当作正当且有效的学术工作。学者们越是如此集体地认可自己的文论书写工作，曹顺庆先生对中国当代文论“失语症”的诊断就越是显现为一种孤明先发的洞见。

20 世纪 90 年代，日益强大起来的中国内地产生了一股强烈的思想层面的诉求：在世界的思想文化、文学艺术中心，应有中国的声音响起。曹顺庆先生怀着这一诉求审视世界文论格局，遗憾地看到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在世界的文论中心场域此时依然处在缺席的尴尬状态，中国当代文论因此无法担负起帮助人们想象当代中国重大历史责任。

总之，曹顺庆先生关于中国文论话语“失语症”的诊断，源于他对当代中国文论在世界文论格局中处境、地位与价值的学术关切，但是，他的关切体现在更为宽广和深层的地方，在他的关切中，文论和国家的世界处境、命运和形象生产是互为表里的。关切的最终目的，在于呼吁学界重新整理、认知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特殊的逻辑与体系，重续文论的原有中国话语传统，赋予文论以中国特有的民族身份和文化价值，树立起学者和国人对中国传统文论的民族自信。

^① 乐黛云：《文化转型时期与中西诗学对话》，《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 年第 3 期，第 4 页。

三、对“重写”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号召

曹顺庆先生号召中国学者“重写”中国文论话语体系，这一号召在他提出“失语症”之时就已经发出。但在他于21世纪上半叶专注地大声号召“重写”且“重写”的对象已经延展到文明史之前，他主要的精力并不在此，那时，他的主要精力在于提出、完善他的文论“失语症”说，并同学界不同的意见进行论战。“重写”中国文论只是附着在“失语症”这一主声部上的次声部，尽管当时曹顺庆先生同他的学生已经出版专著，发表文章，用中国古代文论话语对现代中外文学作品进行阐释，尝试将在文论现代性生成的起点已经死去的中国古代文论在当代中国文学阐释活动中复活，但是，对于中国文论现代转型的有效性，曹顺庆先生一直持怀疑态度。并且，在那一时期，曹顺庆先生关于重写文论史的呼声也还没有明确地作为他后来发出的重写文明史号召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学界论争的声音一直集中在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书写是否患上“失语症”这一问题，而对文论“重写”的吁请鲜有人给予认真的回应。

事实上，吁请学界重写中国文论史，重树中国古代文论自主知识价值，从历史和理论两个维度真实地、整体地再现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是在曹顺庆先生号召重写中国文明史时，才真正成为其文论之思的主声部。曹顺庆先生重写文明史的号召，是具体落实到各学科文明史的重写之上的，而中国文学理论史、文学批评史的重写，正是其题中应有之义。重写文论史的目的，在于将传统文论整体地置入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中，在与现代国内外文学思想和精神的对话中，构成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的主体框架、核心逻辑和本质论，有效地应对当代文学的种种现象和问题，铸成中国当代文论的中国身份，让中国当代文论因此获得学术和理论的力量与优秀品质，以赢得同西方文论对话的资格，让世界愿意听取中国文论独特的声音。

当曹顺庆先生在21世纪呼吁学界重写文明史之时，他所说的文明史既是指一种文明特定历史的整体形态，又是指文明史的具体结构，即一种文明形态所有的各个学科史：“怎样建立中国话语及自主知识体系，学术界一直在奋力探索，然而效果却不甚明显，根本原因是没有找到恰当的抓手，无法做到‘踏石有印，抓铁留痕’。话语是在言说中呈现的，或者说，话语最先是在对文明史（包括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经济史、法律史、科技史等各学科

史)的认知和言说,叙述和阐释中形成的。”^① 此处虽然只说到“文学史”,但其实,文艺学作为文学的二级学科,本来就是文学内含的理论场域,因此,号召对文学史的重写,等于同时号召了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之历史的重写。对文论史的重写,必然涉及对中国当代文论自主知识体系的重构和价值重估。显然,在曹顺庆先生21世纪发出重写文明史的号召^②里,文论“重写”依然被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此时的“重写”不再只是为文论一家,中国当代文论的“重写”已被纳入重写中国文明史这一恢宏的文化工程中来,对中国当代文论的“重写”在承负文论自身建构自主知识观和学术话语体系的历史使命的同时,还承负了建构中国思想文化整体的自主知识观和学术话语体系的重任。

中国当代文论为什么需要“重写”,“重写”为什么需要曹顺庆先生专门撰文来大声地呼吁?曹顺庆先生一则说,迄今为止,在全球语境中占据中心地位的人类文明史书写都是由西方人发起的,是以西方文明为中心建构的世界文明史,所书写的文明史既以西方文明为人类文明之中心,又认为西方文明在世界各种文明中是最为优越的。西方人的这种文明史观以及他们所书写的文明史是同世界文明史真实的客观情形不相吻合的,至少西方人自己引以为傲的文明之源古希腊文明,相对于东方最早的文明而言不过是一种世界次生文明。西方人写出的人类文明史既然在本质上是罔顾事实的西方中心主义和西方优越论的作品,所以,重写人类文明史,或具体地说,重写东方的、中国的文明史就显得非常必要。曹顺庆先生又认为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所代表的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主要源头之一,就此而言,西方至今关于中国文明意义与价值的看法要么是肤浅的,要么是错误的,甚至是妖魔化的,因而是不可取的。曹顺庆先生所说“重写”的理由是没有问题的,事实的确如此,迄今为止,哪怕是由西方的东方主义学者所做出的关于中国文明和文化的认知,都与事实上的中国文明和文化不相吻合,在西方哲学界,像德里达这样的观点是极为罕见的,他认为哲学不过是欧洲形态,中国的象形文字则是思想的非欧洲形态,所以,中国没有哲学,却有思想。德里达等于是基于语言中心主义把哲学定义为人类思想的欧洲形态,而基于象形文字认为中国古代的文本乃是人类思想的非欧洲形态。我们不能说哲学这个思想的欧洲形态必然地要高于中国文本所显现的思想的非欧洲形态。

^① 曹顺庆、刘诗诗:《重写文明史》,《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第5页。

^② 曹顺庆、刘诗诗:《重写文明史》,《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第5页。

曹顺庆先生指出，当世界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而一直在误解中国之时，中国自己的学者应该挺身而出，为世界写出真实的中国文明史，以正世界受众对中国文明的视听。

曹顺庆先生提出重写中国文明史的号召，以此纠正西方人对中国文明一直以来种种错误的看法，实际上是从学术层面号召中国学者主动向当代世界展示中国文明真正的历史形象，而在本质上，重写作为一个浩大的文化工程，是对中国文明现代性的一次重置。之所以是重置，是因为中国近代学者中很多人奉行激进的拿来主义，他们在历史上初次为中国文明置入了秉承自西方的现代性，但是，他们为近代中国置入的现代性以对中国旧有文明的整体弃绝为前提，因此，其置入的现代性乃是文明“弑父”的产物，乃是基于历史的断裂而新生的文明品性，在其新生之处，中国文明的历史被无情地挡在了断裂的另一边。这造成了中国文明自近代获得现代性之后一直存在的一个诡异的情景：从近代开始，一直到当代，中国文明的历史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就其整体而言成为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品，人们观看、欣赏、研究、谈论这一陈列品，但并不真正地居于其中，这一陈列品成为中国人眼中的身外之物，而不再是中国人的存在和存在于其中的世界。另一方面，自近代以来，哪怕是为中国学者撰写的中国文明史，也主要是依托西方关于文明史的知识观、历史观和理论框架来进行书写的，其书写丢弃了《国语》《史记》《汉书》等古代史书奠立的中国历史书写范式，而主要是用中国古代史料来填充西方史学的语述框架，用西方史学的话语体系建构中国自古以来的文明史，这样的文明史书写因此同样患上了学术性质的“失语症”。

曹顺庆先生所号召的重写，写作主体是不是中国学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重写赋予中国文明的现代性在知识观和话语体系上必须是中国的，而非西方的；在重新写成的文明史中，传统中国和现代中国不是一死一生的两个世界，现代中国文明同古代中国文明之间也不是断裂的关系，而主要显现为二者相互证成，相生相映，形成合力，经纬交织，历史语述要处处体现对现实问题的学术关切，涉及现实的语述也要处处可见中国文明的历史厚积，中国文明的历史和现实共构为中国文明应有的现代性，共显为中国文明自古至今的厚重多元的现代形象。

总之，笔者将曹顺庆先生关于重写文明史的号召所具有的现代指向理解为：重写中国文明史不仅是对历史的再现，更是对当下和未来之中国文明的创建和生产，是对曾经错置的中国文明史现代性的解构和重置。考虑到曹顺庆先生发出“重写”号召的时间是在中国文明史现代书写之后，是对已写的中国文明史之现代性乃被错置的现代性的指认，故其号召乃是为中国文明史

置入应有的、体现中国自主知识观和话语体系的现代性。我们认为，如就“重写”号召作为发生在现代之后的事件而言，“重写”应是一个后现代事件。然而，就“重写”的建构性和对中心本身的认可而言，“重写”在本质上却是一个现代性事件，因为重写文明史的号召虽然是针对中外已写中国文明史现代性的批判，但是，它同时承诺中国文明史可以有自身正确的、尚待建构的现代性，且将中国文明史应有之现代性重置作为“重写”最主要的目的，而为文明史书写重置现代性的总体精神乃是建构，乃是对世界现存之中心和边缘共构整体格局的价值认可，建构对文明中心格局的认可，表明重写文明史这个文化诉求的本质乃是现代性的。

重写文明史事件发生在现代之后，却依然是现代性事件，这是由现存世界之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在总体上依然是现代的所决定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当代世界虽然已经处处可见后现代景观，尤其是众声喧哗的全球化语境曾如春风一度吹散冷战坚冰，颇有对中心和边缘之世界既存格局给予解构分化的趋势，学者敏锐地指出后现代作为现代性危机的揭示、批判、破坏和逃避，用解构的哲学对结构主义进行清算，个人在当代日常生活中确实感受到了自身存在的虚无、平面化、碎片化和单向度，但是，在国家层面，居于中心的国家、由中心和边缘各国联合，代表其共同利益的不同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意识形态利益集团一直存在，中心从来就为既存的中心国家所坚守，边缘一直为居于边缘的国家所愤怒。而当全球化语境为最近新冷战的西风吹散之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现代格局的保守性就愈加明显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把曹顺庆先生于2023年发出的重写中国文明史的号召放到当下世界所具有的强大的现代性天穹下来审视，我们可以确认“重写”乃是一种关于中国文明之现代性诉求，即要求在世界范围内为中国文明正名。正名，是希望中国文明和中国文化洗尽曾遭受的一切名之污秽，以自身真实的力量从世界之边缘突围而出，成为世界之中心的一个部分。

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曹顺庆先生关于重写文明史的号召绝非民粹主义的声音，绝非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而纯然地是出自学术的考量。作为学术的焦虑，其在本质上体现的是关于真理认知的一种情怀，这种情怀把科学精神看得高于一切。这具体到“重写”的号召上，则是曹顺庆先生对于已写的中国文明史理论、史述与事实严重不相吻合，理论和史述的主干框架、话语逻辑同其所处理之史料无法对位，心有不安，希望有所改变。因为在曹顺庆先生看来，中国文明在古代本有其自主的、具有特殊性的知识观、话语逻辑和历史形态，它与西方源自古希腊文明、标榜理性和科学精神的史观本不同，出现的时间比古希腊文明更早，是人类文明史最早的源头之一，这样的

中国文明居然不为西方所知，未居于世界之中心，这是反科学的、不可理喻的。这一看法等于是指认那些以西方科学理性之名抹去中国古代文明的历史和现实价值的历史书写，其本身是违背科学的。其反科学之处主要在于这类中国文明史的撰著是概念先行的书写，是让中国古代文明史的撰著成为西方文明史观的祭品。曹顺庆先生的这一看法实事求是，与中国文明的历史相吻合，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综上所述，曹顺庆先生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到现在，对中国当代文论的现代性问题给予了创造性的深思，他对中国文论自近代开始创起、学界至今仍在遵循的书写方法给予了质疑和批判，指出中国当代文论在最初以主动放弃中国本有的文论知识观和话语体系为代价而换取自身的现代转型，从而患上了“失语症”。曹顺庆先生所说实际上揭示了中国文论自近代以来所获得的现代性，以及其生产自身现代性的方法，在学理上实际都不具有正当性，是步入歧途、被中国学者错置的现代性。曹顺庆先生在 2023 年向中国学界同仁郑重发出重写文明史的号召，把文论史重写作为题中应有之义，呼吁通过“重写”，为中国文论赋予在学理上合法、正当和有效的现代性，“重写”既是号召客观再现中国文论前现代性，更是对中国文论被错置之现代性的纠偏和重建。此号召在本质上是对中国文论自主的知识观、话语体系之世界意义的敞亮和去蔽。而在更为重大和宽广的层面，重写中国当代文论既是重写中国文论史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重写中国文明史的具体实践，就后者而言，重写中国文论的意义已经不再局限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而主要是对中国文明的世界性历史意义和价值所进行的揭示和重估，是对中国文明之世界形象的重塑。在这方面，“重写”对中国原有文论知识观和话语体系的去蔽更主要是对中国文明在历史—现实框架中之世界意义与价值的去蔽。曹顺庆先生关于重写中国文明史的号召一旦付诸实践，必将是 21 世纪中国学界承担的一项特别重大的文化工程，我们对此充满期待，相信随着“重写”工程的展开，中国文论的世界形象将被改写，中国传统文论将不再是毫无生机的陈列物，而必然会基于其独特的学术意义与价值，成为居于当代世界中心的文学理论话语，成为人类关于文学的思与言的一种主要方式。

曹顺庆先生一生执教于四川大学，其文论之思与言发生于成都府南河和江安河畔，其关于中国文论“已写”和“重写”的沉思与号召对中国当代文论学术领域的巨大影响，让我们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初唐之时蜀人陈子昂从理论和实践上对宫体诗风的批判和革命，而正是因为有了陈子昂的呼喊，中国诗界才步入了自己在历史上的最高峰——盛唐。所以，后人念及子昂的历史功绩，而欲以黄金铸造子昂雕像以纪念之。今之曹顺庆先生，于人皆迷于中

国文论现代性错置之时，发出呐喊，惊破学人迷梦，开启新的中国文论研究之学术道路，诚类于陈子昂之所作所为也。

作者简介：

刘朝谦，四川师范大学艺术研究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赋学会副会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理事，四川师范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